

# 17 世纪锁国体制下中日民间贸易兴盛原因探究<sup>\*</sup>

李晓燕

(盐城工学院 党办 江苏 盐城 224003)

摘 要 :17 世纪 ,中日两国分别实行了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 ,两国的官方贸易完全停滞 ,但民间贸易却兴盛不衰 ,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是锁国政策与中国区域社会利益的矛盾 ,中国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对市场需求以及日本江户幕府对中国商船去日贸易的鼓励等。

关键词 :17 世纪 ;中日 ;闭关锁国 ;民间贸易 ;兴盛 ;原因

中图分类号 :F1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509X(2003)02 - 0045 - 02

17 世纪 ,中国正处于明清交替之际 ,日本则从丰臣秀吉时代进入统一的德川幕府(又称江户幕府)时期。在这一时期 ,两国不约而同地实行了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一方面 ,中国政府禁止中日商船互相往来进行贸易 ,另一方面 ,日本政府也不允许日本人来中国贸易 ,但却允许中国商人去日本贸易。官方贸易已经完全处于停滞的状态 ,可是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却获得了长足发展 ,不管中国政府如何严令禁止 ,都无法杜绝中国民间商船去日贸易。根据史料记载 ,当时的贸易情况是 :“由于日本德川幕府准许明商至日贸易……并且(在中国)与官方有亲属联系或以金钱取得出海凭引 ,因而明日私商贸易事实上变成半公开性质。<sup>[1]P.269</sup>”进入清代以后 ,情形也大致如此。随着形势的发展 ,明清海禁政策时张时弛 ,私商航海贸易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中日民间贸易兴盛不衰。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第一 ,明清政府海禁政策的实施 ,堵死了一切可以互市的途径 ,与区域社会的利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也是当时中日民间贸易一开始以走私形式出现的主要原因。

中国与周边诸国的贸易往来历史悠久 ,而大规模的海禁政策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朝的前两个世纪里一直实行较严厉的海禁 ,直到 1567 年(明隆庆元年 ,日永禄十年)明政府才迫于形势而部分开放海禁 ,但仍规定“不得往日本倭国”贸易 ,否则严厉处罚。1612 年(明万历四十年 ,日庆长十七年)杭州商人赵子明等和 1613 年(明万历四十一年 ,日庆长十八年)嘉兴县陈仰川、杭州萧府杨志学等百余名就是以“潜通日本贸易”罪而被捕入狱的。<sup>[2]卷496</sup>。但即便如此 ,海商仍然铤而走险 ,从事走私活动。清朝沿袭明朝海禁政策 ,从山东到广东几千里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迁海清剿 ,断绝内地和外洋的交通 ,严禁东南沿海一带的商民出海贸易 ,西方商船也不准进出东南沿海各港口。只以远离东南沿海的澳门一处港口 ,作为对外贸易口岸。

这种全面的严厉的海禁政策与东南沿海地区 ,尤其是

与当时海上贸易活跃的闽广地区的利益背道而驰。1564 年(明嘉靖四十三年 ,日永禄七年)福建巡抚谭纶疏称 :

“福建”海滨而居者 ,不知其凡几也 ,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 ,……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 ,漳州白糖诸货 ,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 ,衣食何所从出 ?如之何不相率勾引为盗也 !<sup>[3]卷2</sup>

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中也说 :

“闽广人稠地狭 ,田园不足于耕 ,望海谋生 ,十居五六。<sup>[4]卷56</sup>”

其实 ,福建省沿海一带地狭人多 ,本地所产 ,不敷食用 ,只有籍贸易之赢余 ,以佐耕耘之不足。所以闽广地区的人民甘冒巨大的风险 ,采取种种形式 ,力图冲破障碍 ,争取自身的利益和权利。所谓“禁之愈严 ,则其值愈厚 ,而趋之者愈众”<sup>[3]卷513</sup> ,正是对海禁政策之下 ,中国沿海商人络绎不绝赴日贸易情景的准确表述。所以 ,1684 年(清康熙二十三年 ,日贞享元年)清朝颁布展海令后 ,中日民间贸易的繁荣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 ,明末清初 ,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为中日民间贸易的广泛展开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自明朝永乐年间以后 ,全国政局相对稳定 ,经济恢复且迅速发展。嘉靖中期 ,东南地区经济发展尤其迅速 ,出现了许多商品生产基地 ,如苏州、上海一带棉纺闻名于世 ,“郊原四望 ,遍地皆棉” ;湖州以生产蚕丝著称 ,福建、广东的甘蔗动连千顷 ;“蔗田几与禾田等”<sup>[5]P.689</sup>。另外 ,手工业产品如杭州的绸缎、江西的纸张、安徽的笔墨文具、福建的蓝靛、广东的锡器、铁锅等也能大批生产。据粗略估计 ,东南地区约占有全国“80% 以上的商品市场和更大比率的商品流通额 ,以及更多的商业资本。<sup>[6]</sup>而当时全国性市场及其网络中 ,由于多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东南地区市场发育较成熟 ,网络较为密集 ,从而成为中

<sup>\*</sup> 收稿日期 2003 - 03 - 17

作者简介 :李晓燕(1976 - ) ,女 ,江苏盐城人 ,盐城工学院助教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文化比较研究。  
万方数据

国国内市场的重心。这种迅速发展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停滞在自给自足的平衡水平,于是买方的缺乏便造成了市场的不充分。过多的商品必然由于国内市场的不充分而产生寻找新市场的欲望。向农村?可能性不大,农民缺乏购买力。那只有向海外了,海外有需求,比如日本。当海外市场不仅广大,而且利润可观时,商品寻找市场的欲望与商人谋利的企图便构成了向海外贸易的扩张力。如果国家允许,这种扩张力就能得到正常的外放,如果国家不允许,它就以各种非法形式实现不正常的外泄。另外,东南地区大多城镇靠海这一良好的地理位置为其张力的扩张提供了条件。所以,在如此严厉的海禁之下,仍有商人渔船甘愿冒险出海经商。真所谓“海中之利无涯,诸藩奇华本一利万,谁肯顿息哉?”<sup>[2]</sup>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贸易数量的考察》一书记载,1611年到1646年约有1100艘“唐船”赴日;1662年到1669年有2819艘,其中从中国本土赴日的为1972艘<sup>[8]</sup>(p.65)。

第三,日本江户幕府早期,为了满足国内需求,增加财政收入,积极鼓励发展海外贸易,对中国商船采取欢迎态度,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沿海赴日的增长。

长期以来,日本对中国所产的商品就十分依赖,尤其是日本贵族、官吏对中国美丽的生丝、绸绢及丝织品等垂涎欲滴,而福建生产的砂糖、冰糖也为日本所必需,正如顾

参考文献:

[1] 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M].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2] 皇明神宗实录[Z].江苏钞本影印版.  
[3] 谭襄敏公奏议·海寇已宁比例陈请乞恩天恩俯容补剃以广圣孝疏.转引自冷东.明清海禁政策对闽广地区的影响.人文杂志,1993(3):110-117.  
[4] 清朝文献通考[Z].北京:商务印书馆.  
[5] 屈大均.广东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 陈东有.明末清初的华东市场与海外贸易[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4):78-81.  
[7] 王世懋.策枢(卷一)[Z].丛书集成初编本.  
[8] 郑永昌.明末清初的银贵钱贱现象与相关政治经济思想[M].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所,1994.  
[9]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Z].四部丛刊三编本.  
[10] 姚士麟.见只编(卷上)[Z].丛书集成初编本.  
[11] 朱亚非.明代沿海城镇对日贸易浅谈[J].山东社会科学,1991(5):62-63.

炎武所说:

是两夷者,其土不蚕,惟籍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而江西瓷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sup>[9]</sup>(26册)

明人姚士麟也在文中写道:

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锦,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sup>[10]</sup>(p.50-51)

同时,江户幕府对中国商人冒险去日本贸易的行为十分支持,且给予保护,还主动向他们订购所需物品。根据日本学者的统计,自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日庆长十九年)至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日正保元年),由福建沿海城镇赴长崎港的商船每年少者34艘,多者97艘,每艘船装货在10万至60万推算,那么每年仅从福建沿海城镇运往长崎一港的货最少可达1500万斤。在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日宽永十七年)一年之内,主要来自福建的商船输入到长崎的绢织物品多达524680丈,棉布和其他纺织品1192715丈。其余如蔗糖、烟草、药材、铁器等则难以做出精确统计<sup>[11]</sup>。可见,当时中日民间贸易是何其兴旺。

# Reasons for the Thriving Sino – Japanese Nongovernmental Trade under the Closed – door Policy in the 17th Century

LI Xiao-yan

( Party Committee Office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03 ,China )

**Abstract** :In the 17th century , both China and Japan adopted the closed – door policy . The official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tagnated . But the nongovernmental trade was still thriving .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reasons from three aspects , namely ,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closed – door policy and the interest of some places , the need of the market to meet to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South – East China and the encouragement from Eto Shogunate to Chinese merchants .

**Keywords** :the 17th century ; Sino – Japanese ; closed – door policy ; nongovernmental trade ; thriving ; reason